

一、新人文主义

新人文主义形成于 20 世纪初,繁荣于 20 年代,30 年代则急剧衰落,只延续了短短的一二十年,在西方,其影响主要局限在美国。欧文·白璧德(1865—1933)是新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

新人文主义以人性为理论出发点,主张以‘人的法则’来反对‘物的法则’,企图通过复活古代人文主义精神,重塑人性,重建“人的法则”来疗救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西方社会的信任危机、道德堕落等社会弊病。“新人文主义”之名由此而来。它将一切社会问题归结为人性问题,归结为人性中善恶冲突的伦理学问题。其理论重点就是所谓的善恶二元的抽象人性论,认为人性中理性与欲望的不断争斗是社会灾难的根源,认为善恶之争不能通过某一种外在权威来平息,必须运用个人的理性对其欲望加以遏制。自我节制论就是新人文主义的核心。

从本质上说,新人文主义不是卢梭式的革命性理论,而是维护现存秩序的,它所具有的清教传统和保守态度,使它远离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主流。然而,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它却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最早将新人文主义引入中国的是“五四”时期的学衡派,但受影响比较明显的则是新月派文人梁实秋等人。

(何林军)

白 壁 德

欧文·白壁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 毕业于哈佛大学, 此后留校长期担任教授。主要著作有《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民主与领导》、《批评家和美国生活》等。

作为‘新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 白壁德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大学很有影响。他主张‘人的法则’, 反对‘物的法则’, 人在言行中应表现出秩序、节制和分寸感, 理性和道德是人的特点和美德。对于文学, 白壁德认为“适当性”是一切人文主义运动的核心, 符合人本质要求, 也是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因此他强调文学的传统, 要符合基督教的伦理原则、柏拉图对于形式的观点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性观这三大美学传统, 同时批判了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潮流: 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 尤以对浪漫主义的批判最力。值得一提的是, 这位倡导“人文主义的、贵族的民主”的保守批评家对我国五四以后‘学衡派’和‘新月派’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书所选的《批评家和美国生活》是白壁德最著名的论文, 也被认为是“新人文主义”的宣言。在文中, 白壁德反驳了门肯的自由主义, 指出美国的批评传统虽然富有创造性, 但缺乏理性的辨别力和判断力。他主张批评中惟一重要的是克制原则,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 批评家才能建立正确的评价标准, 批评也才能达到足够的思考深度。

(严明)

批评家和美国生活

[美] 欧文·白璧德

文美惠译

法国人谈到美国人的时候常常说：“他们是孩子。”把这句话解释一下，就是说在法国人的眼里，美国人像孩子一般地无批判力。这个评语仅就一般性的批判智力来说是恰当的。美国人在处理商业和工业社会的特殊问题上已经表现出他们也能有丰富的判别能力。举例说，有些美国人在估计股票和公债的价值时发挥了一种简直有些神妙的锐利判别力。然而正是这些在某种范围内这样敏锐的人，在需要一般判别力的问题上却常常显得孩子气。但是在现在这样的时代，任何事情，从选择一种宗教信仰一直到选择一种香烟都处于川流不停的宣传之中，因此一般性的判断力就更加显得需要了。

事实上现在许多人宁愿有创造性而不愿有判断力。我们不但有创造性的诗人和创造性的小说家，还有创造性的读者、创造性的听众和创造性的舞蹈家。近来又出现了另一种创造性的形式，它颇有吞并所有其他形式的可能，这就是创造性的推销术。连批评家自己也受到了感染，也力求具有创造性。当 he 从另一个人由于纯粹气质流露而产生的作品里得到极其鲜明的印象然后通过他自己的气质产生出一件新的创作时，这位批评家就被认为是有创造性的。在批评家和创作家身上被消灭了的是任何一种超乎气质之上，因此可能阻碍气质要求表达自己的那种热望的标准。

这种把批评当作自我表现的见解对于我们目前的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大英百科全书最新版^①上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批评家”的 门肯先生就是如此理解的。门肯先生说：“批评家始终只不过是表现自己。他想因此使内在的自我得到一种欣慰的感觉，仿佛感到一个使命已被完成，紧张的心情松弛了下来，得到一次 Katharsis^②，正如瓦格纳写《Die Walküre》^③时所感到的那样，又如一只母鸡每次下蛋时所体会到的那样。”这种他自己和别人都付诸实施的创造性的自我表现，如门肯先生所说，就有幸搅动了美国文坛停滞的死水：“今天在美国批评界多

① 最新版：第十三版。——原编者

② 意为“净化作用”，一译“陶冶”。

③ 《待嫁》。

年以来第一次有了争论……异教徒们勇敢地进攻，教授们被迫进行自卫。他们时常不止于自卫，还进行反扑。耳朵被咬掉了，鼻子打得流血了。胸部和腹部都挨了揍。”

然而批评恐怕不只是门肯先生让我们相信的那种东西，简单说，不只是波希米亚人之间的混战，这些波希米亚人每一个都争先恐后地招徕公众注意他那种牌子的自我表现。把批评贬低到只是满足气质的需要，只是说出某人的艺术爱好或憎恶（在门肯先生的情况下，主要是后者）的确就完全违背了批评这个字原来的字义，即辨别与判断。人们对门肯先生这样一个具有特殊用词技巧同时在气质上又不负责任的作家最高的希望只能是高级的智力杂耍。我们必须承认他具有一定的真正批判才能，例如在颇为狭窄的范围内具有精明的观察力。但是他的著作给予人的整个印象与其说是严肃的批评，不如说更像智力杂耍。

严肃的批评家所更关心的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建立正确的评价标准，用它来准确地观察事物。他的主要美德就是均衡。他给我们带来的特别好处就是在两种对立的疯狂中间起调节作用，处在这种对立的疯狂中的人经常是摇摆不定的，路德^① 把它比做喝醉酒的农民在马背上前仰后合。批评家对任何特殊情况的观察都可以是带讽刺性的。如果责备门肯先生对美国情况的观察总是毫无例外地不满意，那倒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在要求更多的建设性意见的后面，那后台老板的声音总是很容易听出来的。一个批评家只要限于对存在的缺点作出正确的诊断，就有很大的帮助。假如门肯先生算不上这样的诊断家，失败的原因不是由于他过分的严厉，而是由于他缺乏辨别力。

人们过去用以辨别事物的标准大多数是传统的标准。另一方面，目前时期的突出事件便是传统性标准的削弱。出现了一种和苏格拉底在古雅典所要对付的紧急情况差不多的情况。任何一个反传统同时又想要辨别事物的人都差不多不能不承认苏格拉底是他的老师。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首先在概括性的名词的使用上进行选择。他创造的从实例归结出界限的艺术，其重要性用两句合在一起的话或许最能说清楚，一句是拿破仑说的：“想象统治着人类”，一句是塞尔顿^② 说的：“音节统治着人类”。当我们让自己的想象以及最终让自己的行为被一个概括性名词控制以前，先对它作一番苏格拉底式的考察是明智的。

所以，在显然这样需要一位苏格拉底的时代，我们却只有一位门肯，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可以举出一个门肯先生缺乏足够辨别力的例子，这就是他对民主这个许多世代都控制着广大群众想象的字眼所采取的态度。他的民主观简直是把卢梭的民主观倒立起来，而正如已说过的，没有什么比一个凸块更像一个

① 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领袖。

② 塞尔顿(John Selden, 1584—1654) 英国律师,学者及作家。

凹坑的了。他没有认识到直接的、无限制的民主和立宪民主之间区别的重要性。如果有立宪民主，我们大概就有了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另一方面，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任何稍为深刻的思想家都认识到直接和无限制的民主，结果都会使自由丧失，终致引起某种形式的专制统治。两种不同的民主观不仅牵涉到两种对立的法制观，而且最后还牵涉到两种对立的人性观。立宪民主党人要求制订克制人民当前愿望的法律，这种要求意味着个人身上类似的两重性——要求更高的自我，以克制普通的、任性的自我。另一方面，要求无限民主的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是仅就这一名词与所谓浪漫主义运动的关系所得到的意义而言。主张无限民主的人对人民的信心是紧密地联系着十八世纪感伤主义者宣称的人性本善的教义的，它本身就标示对全盘堕落的教条极端厌恶。性本善的教义赞同气质自由扩展，这一点当我谈到创造性批评家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

可是，假如我们要想理解门肯先生的意思，区分两种不同的气质论者就非常重要：一种是柔弱的、感伤的气质论者，抱有各种各样的“理想”。一种是硬心肠的、尼采型的气质论者，他因自己是现实主义的而引以为傲。事实上，如果把逃脱传统的控制只看成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的好机会，那么还不如立刻从理想阶段过渡到尼采阶段，尽量避免中间幻想破灭的过渡期间。无论如何，不能否认门肯主义的兴起正值政治上和其他一些方面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某种崩溃。战后进发的、许多幻想的破灭也给它提供了有利的气氛。

门肯主义的症状是我们所熟悉的：冷酷、自作聪明以及一种不分青红皂白地嘲笑所有正确地或错误地确定下来并受到尊重的事物的脾气；一种把现实看成是门肯先生称为“冷冰冰粘糊糊的事实”，以及认为对待这些事实的惟一办法就是消失到纯粹浪漫的非现实里去的倾向。这些特点和类似的特点散布得如此广泛，以致不管我们对于作家和思想家的门肯先生有什么看法，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代表性。目前他是那些自称解放了的人的主要预言家，但是如布罗纳尔先生^①说，这些人不过是解开了扣子而已。

无论如何，最主要之点在于对待克制原则的态度。那些不管以什么形式或者在什么程度上主张这个原则的人都被解放了的人称为反动派，或者更严重一些，称为清教徒。门肯先生要我们相信历史上的清教徒要求道德谨严也是不诚恳的，他们喜欢“和荡妇与烈酒进行可悲的交往”。这可以作为一个作家为了追求一时的臭名远扬宁可牺牲长远的名誉而作的徒有其表而实际毫无辨别力的论断的一个例子。关于清教徒的事刚好是复杂的，需要十分苏格拉底式地处理它。曾经有人说，清教徒的观点与其说是真正基督徒的不如说是禁欲主义的，这话倒

^① 布罗纳尔(William Crray Brownell, 1851—1928)：美国文学批评家，与新人道主义者有联系。

不是完全错误的。正在进行的，关于清教主义和资本主义上升及它美化追求财富的生活之间关系的讨论也是有根据的。清教徒一开始就毫无例外地改造自己也改造别人，这也同样是事实，他这个特点就使他和门肯先生所深恶痛绝的，今天的人道主义多事佬或者“疯狂的清教徒”有了联系。

然而敬畏、虔诚和谦恭仍然是基督教的美德，清教徒身上还有这些美德的某些残余。对于具有代表性的清教徒如爱德华兹^①之流，这些美德和天恩的照耀，和他称之为“一种神圣超凡的光辉”是不可分割的。从爱德华兹之辈对上帝的爱恨过渡到人道主义者所号称的对人类的爱和服务，这中间显然失掉了某种东西，某种十分接近于核心的东西。这失掉的东西就是内心生活及它所产生的特殊类型的克制。由于内在克制的逐渐减弱，就只好求助于加强外部的控制。代替真正的清教徒，我们就有了人道主义的立法家，他们通过了无数法律来管制那些拒绝克制自己的人民。我们的社会道德家的活动简直谈不到什么“神圣超凡的光辉”。这就是被我们那些半瓶醋知识分子的糊涂思想弄得模糊不清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这样使得我们无法看见真正的问题，即如何保持内心生活的问题，哪怕我们拒绝接受清教徒那一套和内心生活联带的神学的梦魇。这个问题所以不能解决还不仅由于清教徒传统。这是我们整个现代生活的失败。然而除非充分地运用批评精神来找到解决方法，我们就只能算是区区的现代主义者而不算是完全的彻底的现代人；因为现代精神和批评精神实质上是二而一的。

一个人没有达到足够的思考深度和批评成熟程度就要解决这种问题，其结果如何，可以用路易斯先生最新的小说^②为例。他受了引诱，离开艺术，写出了一些乱骂一气的东西，就算是乱骂也骂得不得要领。假如天主教目前有崩溃的危险，也并不是因为它有时偶尔造成了一个埃尔玛·甘特雷。它真正应该受到的责备是在于：当它倾向于现代主义的时候，它不但放松了对某些教义的控制，同时也放松了对人类天性的一些事实的控制。最重要的是它未能以某种现代的批评的形式表现出一条不幸从上述事实得到很大支持的教义，即原罪的教义。一眼看去，门肯先生似乎是认定恶的。例如，他把民主的本质方面归结为“雄雌豺狼之间的战斗”，这时候他和庄严的基督徒之间至少有了一条联系的纽带。

但是，表面现象是迷人的。基督徒首先就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老亚当”；因此他谦恭。反之，门肯先生著作的效果却不是产生谦恭而是产生骄傲，一种最终建立在谄媚之上的骄傲。读者，特别是年轻的、厚颜无知的读者在想象里把自己想成为门肯先生，认为自己是一种阴沉而爱嘲谑的神明，居高临下地观察下界无

① 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美国宗教活动家。

② 此处指《埃尔玛·甘特雷》。

数“蠢材”。这种态度对于一个曾经研究过现代运动的人并不是特别新奇的。我们不由得特别想起福楼拜，他在收集资产阶级蠢货的勤奋上可以和门肯先生在编纂《美国文史文献》^①时的勤奋相比美。福楼拜发现这样做不能增加他的幸福，这个发现在门肯先生一定认为是不相干的，因为他已经向我们说过他不相信什么幸福。他也许会认为福楼拜的另外一个发现比较值得加以考虑。福楼拜告诉我们：“责骂笨蛋的时候，自己有变成笨蛋的可能。”

要想躲开门肯先生和他的学派过分心安理得的讥讽，惟一的方法或者就是重新肯定内心生活的真理。因此就需要尽可能地澄清那种以为内心生活所最终赖以存在的克制原则只不过是教条和传统的想法，而肯定克制原则是一个心理上的事实，并且还是一个既不“冷冰冰”又不“粘糊糊”的事实。许多所谓的现实主义之所以冷冰冰和粘糊糊，正是因为不肯承认这个事实。的确，苏格拉底式批评家的重要任务就是把“现实主义者”这个高贵的名词从它目前的堕落境况中挽救出来。对现实的看法如果忽视了人身上仅仅由于气质而使地向相反方向发展的因素，也就是特殊性的人类因素，那么这个看法就可能是十分片面的。难道当清教徒密尔顿宣称“能够掌握自己，控制自己的激情、欲望和畏惧的人是高于帝王的”的时候，比起德莱塞先生用他特殊的方言叙说“那些全世界一切道德或非道德都建于其上的有机物的调整”时，他的话就要不真实一些？

事实上我们可以根据运用克制原则的程度和性质划分出两种主要类型的现实主义，我们可以把这两种现实主义称为宗教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现实主义；当克制原则逐渐中断了的时候，又有第三种类型出现，我们可以叫它做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传统性克制既然削弱，随之就产生降低到自然主义水平的现象，这是无可怀疑的。目前时代特殊的恶习是由于放纵和破坏了度量的法则而产生的，并不是我们的现代主义者要我们相信的那样，由于禁令和传统的清规戒律的蛮横专制所造成的。事实昭然若揭。在对解放的要求和对克制的需要之间必须进行细致的调节工作，这已经由歌德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了。歌德并不是以清教徒身份，而是以一个清醒的有丰富阅历的人的身份在说话。他说，任何事物，如果只解放了精神而没有相应地增加自我克制的力量都是有致命危险的。这句话似乎完全能够概括我们“狂热的青年”^②的情况。

现在还在进行的这个运动，从一开始起和克制原则的关系就是不正确的。希望这个运动的尾声会给予它“最初活跃的起跑阶段”所没有给予的东西，将是

^① 《美国文史文献》，为门肯所编杂志《美国信使》中的一栏。该栏剪辑美国当时的报纸杂志文章，目的是为了讽刺。

^② 狂热的青年：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用来称呼当时追求刺激的青年一代的名称。——原编者

徒劳的。桑德堡先生^①说到“人们可赞美地反抗一切写着‘禁止’的牌子”。对这种纯粹暴动态度的一个抗议就是：由于过去一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以上无休无止地重复，它已经带着太强烈的所谓“单调的反感”的气味了。对这种态度比较更严重的一个抗议就是：它鼓励了一种无限制的、仅只是气质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刚开始似乎使人迷惑，却并没有给现代人提供一条逃出科学宿命论者织在他四周的罗网的道路。

最新类型的现实主义者实际上和心理学家们——腺心理学家、行动主义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有着紧密的联盟关系。这些心理学家，不管他们自己之间有什么分歧，在宿命论的倾向上是一致的，因此和宗教的现实主义者和人道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在根本上是有抵触的。保卫意志自由所应采取的恰当方式看来是应当坚持意志自由为一件经验的事实，这件事是如此根本，以至宿命论者的主张逃开了意识的直接材料而倾向于形而上学的幻梦。我们当然应该尊重自然主义心理学中真正实验性的东西；但是它实验中所注意的事实和它所忽视或者否认的事实比较起来，却是不重要的。实际上它正在走向伪科学的丑恶的极端，使它给苏格拉底式批评家造成了一个亮闪闪的目标。

总之，这是关键问题，所有别的问题都以之为转移，因为道德自由的问题——人是自主者还是仅仅是自己冲动和感受的傀儡的问题——不解决，别的任何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而要在目前条件下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有最敏锐的批判判别力。没有这种判别力充分支持的创作，很可能是未成熟的。

我们可以从德莱塞先生的《美国的悲剧》这部被某些人欢呼为近代小说的“额非尔士峰”^②的书里举出一些例子。他在这部作品里制造了一些真正悲惨的东西；但是悲惨得没有目的。读者已经充分而又充分地感到了悲惨的不安影响，却没有得到真正的悲剧不必通过露骨的道德说教往往就给予读者的那种最后精神上的宽慰和开展。勉强挣扎读完八百多单调的书页而最后留下一种压抑感是不上算的。压抑感的原因是德莱塞先生没有站在比“有机物的调整”更高的水平上，换句话说，没有站在比动物行为更高的水平上。悲剧可以承认命运——希腊悲剧就承认命运——但不是承认自然主义的命运。这一点上的混乱结果可能影响比德莱塞先生更杰出的作家例如哈代的名誉。许多现代作品充满了徒劳无益的和沮丧的气氛，大部分应当由自然主义类型的宿命论负责。最后，我们和当代一位诗人有着同感，他说‘尘埃’是一个共同的源泉，从这里

涌现出

蟋蟀的叫声和但丁的梦。

① 桑德堡 (Carl Sandburg, 1878—) 美国作家。

② 额非尔士峰，即我国的珠穆朗玛峰，此处指德莱塞小说成就很高，有如世界最高峰一样。

任何人，只要他承认现实是从尘埃而来的，不管由尘埃里出来的是一只蟋蟀还是一位但丁，那么，他就必须准备从宗教的观点或者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做出具体的牺牲。首先，他必须牺牲由于在某种形式上承认人类天性的两重性而产生的深度和敏锐感。许多所谓的现实主义者鼓吹的为性本身而对性产生的过分兴趣，和描绘精神法则与肢体法则的冲突所产生的兴趣相比较，实在是一种颇不体面的代替品。仅只是自然主义类型的现实主义，也意味着牺牲在美这个难以捉摸的词儿中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和这个牺牲有密切联系的牺牲还有优美、高尚和卓越。连现实主义这个字眼本身也成了这些品质的反面含意了。举例说，当我们知道某人写了一部关于某个伟大人物的现实主义著作时，我们事先就能肯定作者用主要力量在证明“普鲁塔克说谎”。这个伟人愈是被贬低到普通水平或者更低的水平，我们就愈觉得他是被“人性化”了。

安德逊先生^①巧妙地论证道，既然我们自己是浮浅的，那么我们的文学如果不是虚假的、伪造的东西，便也应该是浮浅的。但是那些希望创作出有意义作品的作家是不能过于深地沉溺在特殊地点和飞逝时刻的气氛中的。他更不能像安德逊先生、德莱塞先生和辛克莱·路易士先生那样让我们感觉出来如果在他们所描写的东西里缺乏粗野下流的话，他们本身是足可以大量补足这个缺陷的。这里还不仅牵涉到失掉卓越的问题。我们现在就要谈到任何一个没有超越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家都必须付出的最大牺牲。他将丧失具有永恒魅力的希望——这是任何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的抱负。由于没有人道主义的或宗教的标准，他就会把现实和现存的混乱混为一谈，因而失掉约翰逊博士称作“一般性的壮丽”的东西。

有些时髦流行的书沉醉在生活虚幻无常的表面现象里已到了这种地步，假如他们居然能幸而留传后世，那也不是作为文学作品，而是作为社会学文献资料。连他们所用的语言在经过一两代人以后，也得需要一本专门的语汇词典才行。他们不但没有给经历的素材加上有条理的形式，反而突出了形式的缺乏。其结果，借用对近代运动有重要影响的已故的斯梯芬·克兰^②的话说，是“喧嚣不堪的语无伦次”。我们可以举出约翰·多斯·帕索斯^③的《曼哈顿渡口》作为这种倾向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帕索斯先生以现实为名义，制造了一个文学上的梦魇。这种作品当作社会学资料其价值也是很小的；除非我们愿意承认住在曼哈顿的人主要是患癫痫病的古怪人物。

① 安德逊(Sherwood Anderson, 1876—1941) 美国作家。

② 克兰(Stephen Crane, 1871—1900) 美国作家。

③ 多斯·帕索斯(John Roderigo Dos Passos, 1896—1970) 美国小说家。

拉布吕耶尔^①说：“制造一本书和制造一只钟表一样，是一种行业”简单说，文学基本上是一个技巧问题。《曼哈顿渡口》的技巧和它所包含的哲学思想都是含糊不清的。二者的含糊不清都无法辩解，除非我们假定艺术的目的在于夸大世俗景象的喧嚣和语无伦次，而不在于抽出它的内在意义。技巧对于诗歌比之对于散文更为重要。我们只需根据技巧的理由就能对目前对于惠特曼高得近于荒谬的评价提出有力的反对。在目前这种非传统的时代，诗人如果不缺乏技巧，或更糟糕的是，如果他不像现在一些以写自由诗为业的人那样为错误的技巧所烦恼，那么就需要对基本问题加以批判的阐述以求得出正确的定义。究竟应该像亚里士多德的定义那样，认为诗是典型的人类行为的描绘，还是像桑德堡先生的定义那样，认为诗是一团“火、烟囱、面饼、紫罗兰、人和深红色余晖的神秘的、审美的数学”，这问题显然牵涉到诗的形式和诗的实质两个方面。

今天美国有许多东西无疑是花哨恶俗的印象主义。然而我们的自然主义支派恐怕还没有发展到我们在桑德堡先生的诗歌或者是帕索斯先生的小说里所看见的那个地步。有些现实主义小说的舆论反应是相当巨大的：不过应当把“问题作品”^②和现代出版家在做买卖的艺术上所获得的技巧估计进来。我们可以说某些书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创造性”广告术的胜利。在并没有什么杰作的地方创造了一个杰作的海市蜃楼。我们最好再回忆一下，某些受到热烈讨论的作品不但不是美国生活的忠实反映，它们更像是某些欧洲运动的迟一步的回声。因为，正像我们在浴盆和卫生设备方面超过欧洲一样，在文学和艺术形式上我们是追随欧洲的——一般往往相差四五十年。谁在九十年代时在巴黎住过，后来又住在美国，谁就会有似曾经历过同样的文学狂热之感，我自己的经验可以作证。德莱塞先生使人想起左拉和他的一派。帕索斯的技巧使人想到龚古尔兄弟^③，我们的自由诗实验家们不但跟随惠特曼，而且还跟随法国的象征主义者，等等。

我们不久就会听到法国文学和批评思潮的某些新发展，虽然它目前还不是决定性的，但已表现出一种彻底脱离十八世纪以来以至在某些方面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文艺主潮的倾向。我们应当熟悉在不同方面表现这种倾向的作家，主要应当熟悉玛尼坦、莫拉斯、拉赛尔、塞利爱、班达，因为他们表现了我们文学界极其稀有的脑髓作用的特性。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像往常那样老实地接受这些作家的全部观点：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正好具有符合我们需要的观点。总之，一个正在它力量最高峰的伟大国家不应当无止境地尾随在欧洲之后，这是不相称的。

① 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ere, 1645—1696) 法国小说家、随笔家。——原编者

② 问题作品，指由于猥亵内容而畅销的书。——原编者

③ 龚古尔兄弟(Edmond de Goncourt, 1822—1896, Jules de Goncourt, 1830—1870)：都是法国小说家。

是创造一些我们自己东西的时候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马上去生造我们自己的“独创性”。它意味着几乎全然相反的意思。今天我们所能做的最有创造性的事情就是去怀疑创造性的全部理论，把它看作不过是气质流露和自我表现，这种东西促使十八世纪的“天才”一直到我们时代一个年轻的极不重要的诗人努力“倾诉他光辉无垠的灵魂”。

真正批判性的观察可以弄明白我们创造性努力之不能令人满意是由于缺乏一种只有文化才能提供的标准。而我们文化的粗糙和渺不足道又是由于我们教育的缺陷，特别是高等教育。所以门肯先生对“教授们”的攻击大部分是有道理的，假使教授们尽到了他们应尽的责任，也就不可能有门肯先生。为公平起见，还应该加上一句：教授们自己，至少是他们之中某些人，已经开始感到一切并非平安无事。我们不能要求比 G 委员会最近呈给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报告里以下一段话更有眼光的东西了：

美国教育由于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能够证明为错误的政治、感情以及教育的理论支配而受到损害。如果某些人的观点占上风，我国的智力生活就无法挽救了；除了纯粹白痴外，人人都进大学，都主要学习社会学、自然研究、儿童研究、公共事务——我们的社会将仅仅在它的庸俗、无知、粗野上是独一无二。即使这样极端的观点轻松地把它打发掉，那也无济于事；它的指摘是太强烈了。这种影响是非常有力的，它们的压力是经常性的；如果美国教育大都失败，原因就在于它们。

简单说，正是由于平等主义民主的侵入，使我们的高等教育在两个明显的方面受到损害：首先在学生质量方面。其次，在学生所钻研的课业质量方面。前者为大家公认，甚至还有一些补救的希望。譬如哈佛这样的学校机构，虽然尚未进行严格的甄别，对不符条件的学生却更加挑剔一些了。另一方面，第二个更严重的缺点——缺乏对学科进行质量的鉴别——却似乎比以前更缺少纠正的希望。主要倾向仍旧是我们姑且称为无差别学位的东西。（举例说，达特默思刚刚把它的文理学士合而为一。）然而，与其混淆这些区别，还不如用尽全部字母来规定出新的学位以适应现代人真正或假想的教育需要。把文学学士的称号不加区别地授给一个主要受的是化学专业教育的学生和一个主要受的是分析希腊文学名著教育的学生就等于抽掉它的实际内容。照这样下去，的确将来文学学士的称号会变得无法说明承受学位者的文化程度，就好像把这个学位授给每一个新出生的美国婴儿一样。

不用说，那些降低和混淆教育标准的人口头上侈谈“服务”。如果不但对美国教育，而且也目前的美国生活作一番批判的考察，几乎必然地会在这个字眼上受到阻碍。苏格拉底式的批评家对待它的态度是不能和门肯先生以及“老顽固”分子的态度混为一谈的。门肯先生说，“当一伙不动产经纪人、股票推销员和

汽车商人跑到一起为服务呜咽痛哭时，不必由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专家进行推测，我们就能猜到有某个人要上当了。”但是，既然对这个流行的美国福音有所怀疑，为什么把弹药花在这样的目标上呢？比天顶的扶轮社^①会员更高贵的人物，用辛克莱·路易士华丽的词藻说，也在“吠叫服务”。要想苏格拉底式地对待服务的概念，就必须考虑到它和两个应当被看作我国文化环境中最有代表性的人——富兰克林和爱德华兹的关系。富兰克林的服务概念已经是人道主义的。爱德华兹的服务概念仍旧是基督教徒不为凡人服务而为上帝服务的概念。富兰克林的主张目前正在蓬勃地发展繁荣，它的繁荣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或者可以根据他影响的主要方面把他称做伟大的超扶轮社员。爱德华兹的主张大部分快要废弃，或者只是以传统的形式残留下来，因为没有教义的支持，正在逐渐随着整个清教徒文化而衰颓。

中间类型可能存在。一个人可以在性格上反映出清教徒的背景，同时对服务的看法又追随富兰克林。这种混合正好在我们最近教育领袖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查理·艾略特校长^②身上可以发现。对他个人品德的钦佩不应当妨碍我们对他的教育观点作最锐利的批判的考察。因为这两件事没有什么必然关系。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考察他比同时代任何人或许都更卖力加以推行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就这方面说，我们大部分学术机构的领导者过去是，现在也仍旧是艾略特校长的后备军。

艾略特校长在他九十诞辰的演讲里警告他的听众严防内省，以免使自己脱离全心全意致力于服务的道路。这种态度和宗教的或者人道主义的态度有着基本原则的冲突。人道主义和宗教都要求内省，把它当作内心生活及它相应活动的先决条件。这种活动消失后剩下的就只有功利主义的外在活动，就会导致对物质效果的片面迷信，最后导致标准化，它被几乎全部外国批评家和许多我们的批评家认为是美国的主要危险。我们不能回到清教徒的内省。我们对爱德华兹之辈作为他“神圣超凡的光辉”的条件提出的神学不禁战栗。但是如我已指出，这并非说我们拒绝这种神学时应当把内心生活一同拒绝。一个人可能在服务的教义里看见许多顺带的好处，然而却仍感到一丝怀疑，感到在从旧的宗教变为现代人道主义教规的过程中，失掉了某种不可缺少的东西，功利主义者的外在活动或者感情主义者的广泛同情心都无法给这种东西提供代替物。

内心生活的问题和另外两个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两个问题在我们高等教育里亟待解决而尚未得到解决：专家问题和闲暇问题。有闲暇的人从事内在的、特殊的人类活动形式，如亚里士多德说，是为了达到一切目的之目的——即

①天顶的扶轮社，见辛克莱·路易士的小说《巴壁德》中的描绘。——原编者

②查理·艾略特(Charles W. Eliot, 1834—1926)：曾任哈佛大学校长。——原编者

他自己的幸福，这种形式是必需的。问题在于是否应当像专家那样同意放弃这种活动，半三不四地、仅仅像追求某种外在目的的工具那样生活，即使这种外在目的是为了人类的进步。现在我们开始时常听到“闲暇”的威胁。据预计，由于机械化的完善，将来的人一天只需要工作四小时就能满足他的物质需要。除非领导者，特别是处于高级学术地位的领导者们指出道路，要想一般群众自己去聪明地利用从外在活动中解放出来的时间将是枉然的。真正的闲暇概念是所有可以称为自由教育的标准最终的来源。到了连我们少数学院和大学的校长们都表现他们在相当成功地考虑闲暇性质的时候，那才是说“美国已经成年”的话的时刻。

就目前情况看，我们的学术机构似乎愈来愈成为“理想主义”的温床了。总的说来，他们一方面没有创立一些和理想有十分清楚的区别的标准。另一方面没有达到标准化，这对于美国文明的前途很可能是一个凶兆。目前辛克莱·路易士先生及其他人所进行的反对标准化市侩主义的斗争基本上是继续过去几个世纪里强硬或温和的性灵主义者对功利主义者把生活机械化所提出的抗议。这种抗议过去毫无效果，将来也可能仍旧毫无效果。标准化市侩主义者卓有成效的对立面不是放荡不羁的人，也不是门肯先生心目中的顽固的感情主义者或超人，而是有闲者。闲暇要求一种与标准有关的内心努力，这种标准反对气质的纯粹扩张，正如反对任何其他形式的纯粹扩张一样。

人文学家的标准在我国不及人道主义理想更受欢迎，或许其原因是这些标准限制了牟利的生活；而完美的理想主义却可能与无限制的商业主义这个怪物结合在一起。认识一下这件事上别人眼中的我们是怎样的，对我们会有好处。我们在外国愈来愈不受欢迎，无疑有一部分是由于对我们物质成就的妒忌，但是世界上其他人对我们判断不在于我们自己怎么想而在于我们实际的行为也是一个原因。如果在我们自己眼里我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民族，照最近的法国批评家齐格弗里先生^①的说法，我们便是一个“伪善者的民族”，齐格弗里要我们相信欧洲人仍然关心更高的文明价值。美国人则愿意为了大规模生产和物质效率而无情地牺牲这些价值。

通过这种推测很容易发现“外国人某种屈尊俯就”的最新形式。文化标准崩溃不但发生于美国，而且也在欧洲。我们不清楚齐格弗里先生自己是否对惟一能使实利主义片面性的活动得到平衡的努力形式有恰当的概念。他提出说，欧洲因十分震惊于美国过度的标准化而倾向于舍亨利·福特而就甘地，这个说法很生动，但不能说服人。但是同时他对于我们所喜爱的服务的理想所作的剖析却

^① 齐格弗里 (André Siegfried, 1875—
年)。——作者

)：美国生活的解释者，法国人。著有《美国已经成

并不是毫无趣味的。这个理想对我们的扩张性并没有成为有效的障碍。全国范围内不受限制的扩张性总是帝国主义的。齐格弗里先生把美国人“强烈的自满，美国人对自己利益颇为野蛮的感觉以及更为危险的，他自己认为是对人类应尽的义务”都算作是可能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成分。不过齐格弗里先生还承认我们的帝国主义可能是一种新的、微妙的实质，并不首先涉及领土扩张。

认真讨论齐格弗里先生的立场以及我所提出的另一些问题将会超出一篇文章的篇幅。假如我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本文开头所提出的培养一般性的批判能力的问题，我的目的就已达到。罗威尔说，在有美国文学以前我们必须先有美国批评，这句格言在今天比以往都更为确切。对那些要求更多的创造性和更少的批评的人，明显的答复就是我们首先需要批判性地对现在所谓的创造性加以考察。我已企图指出，这方面的观察会超出文学范围，伸展到我们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最后集中在我们的高等教育上。

我们无法接受门肯先生及其学派的自我表现，把它作为这种真正批评的替代品，除非我们的确像我所听说南美洲人对我们的评语：“他们是一个不十分严肃的民族！”对的，读者可以考虑我自己到底是一个批评家还是一个冒牌批评家。我只表示一点希望，就是当我夸大批评的作用时，不致使自己太像莫里哀笔下的跳舞教师，我们还记得这位跳舞教师断言：“人类一切错误、世界年鉴上记载的致命的挫折、政治家的缺点、伟大统帅铸成大错的原因都是因为不会跳舞。”

（选自《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编，作家出版社，1962年。）

二、直觉主义和意识流

直觉主义美学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流行于欧美各国。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柏格森的美学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著作《时间与自由意志》、《笑》、《形而上学导论》、《创造进化论》等之中。德国—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雨果·闵斯特堡(Hugo Munsterberg, 1863—1916)也是这一流派的重要人物,其代表作是《艺术教育的原则》(1905)。

直觉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是“生命哲学”(Philosophie des Lebens)。生命哲学无限夸大生命现象的意义和作用,强调生命的运动、变化,反对用经验和理性的方法来认识世界。直觉主义美学把艺术和审美感知看成是某种生命冲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催眠,同理智很少有共同之处。直觉主义美学把直觉当成一种超越人类理智和整个客观世界的认识,直觉的过程是不依赖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更不依赖实践的过程,直觉的境界是一种主客体融合为一的无差别境界。直觉支配理智,但它却不依赖理智而存在。因此直觉是一种神秘而不可捉摸的东西。直觉的真正寄居之处是艺术,它实质上仅仅是对艺术家精神体验的认识,艺术家只描绘自己的内心世界,只表现自我。因此,直觉主义美学否定艺术的认识和实践意义,把艺术与现实隔绝开来。

直觉主义美学十分强调以至夸大个性的作用,主张从个体的角度看待艺术家的个性,认为个性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体,但把个体性作为个性的本质,而社会性对于个性来说,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表面的东西。这样,直觉主义美学就把个性同普遍性对立起来,认为艺术仅提供个性而不能认识普遍性。直觉主义美学对于超现实主义、意识流等艺术流派具有重大影响。

意识流,指意识、思维活动是一种连续的、变化不定的、斩不断的“流”,就像河流那样处于川流不息的状态。它是一种创作原则、写作方法和写作技巧的总称。意识流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1884年发表的《论内省心理学所忽视的几个问题》的论文中提出,随后,他又在《心理学原理》(1890)中多次谈到“意识流”,将之比喻为“河”或“流”。他认为意识流具有重要的特性:属于人的意识、经常变化着的、连续不断的和具有选择性。后来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又提出“心理时间”论,强调“真实”存在于人们的“意识的不可分割的波动之中”,并劝作家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跟着人的意识的流动来刻画人物。几乎在同一时期,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创造了精神分析学,扩大

了詹姆斯的‘意识流’说的影响,又发展、完善了它的内容,为‘意识流’作家洞察、描写人的心理起了规范作用。他们三人的理论互为依赖、互为支持、交织融合,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意识流”小说的创作理论。以后“意识流”成为西方现代文艺的许多部门(特别是小说和电影)广泛运用的一种写作技巧。

小说和电影中的“意识流”说法,强调作家应捕捉其作品人物意识的全部流动过程,而不局限于单纯描写其合理的思想。意识流小说通常使用内心独白的叙述技巧,主张自然地描绘作品人物无数连续不断的、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和下意识的印象,这些印象与他合理的思想倾向一起形成意识之流。

把意识流作为一种表现方法,有助于揭示人的意识活动的复杂性,也更接近于意识活动的本来面貌。文艺创作者接受了意识流理论的影响,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变得更深入细致了,特别是在捕捉瞬间的感受和印象、再现跳跃式的联想方面,更显得敏锐了。同时创作方法也出现了种种变化和开拓。这些变化,从积极方面来说,更加适应于表现现代生活。但是,意识流的盛行也有消极作用:在心理描写上易流于自然主义,忽视典型心理特征的刻划,而且还会使文艺作品变得难懂。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 1913 年出版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中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意识流小说又发展成为包括小说、戏剧、电影和诗歌在内的意识流文学,出现了“意识流”的创作高潮。到 20 年代,意识流小说已成为西方现代文学中最有力量、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有: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英国作家沃尔夫的《到灯塔去》、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等。到 20 世纪 40 年代,随着意识流大师们的相继去世,完全而成功地运用意识流方法创作的作品已没有了,意识流作为一个流派已不复存在。

(张德兴、刘慧姝)

柏 格 森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是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柏格森天资聪颖,兴趣广泛,不仅哲学,而且数学、心理学、文学等都有成就,特别是文学修养很高,1928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论著有:《时间与自由意志 论意识的直接材料》、《笑 论喜剧性的意义》、《形而上学导论》、《创造进化论》等。

柏格森的哲学以鼓吹非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而闻名。他认为,人惟有凭借非理性的直觉,才可望沟通世界的本质。艺术是一种直觉。艺术家的心灵在于能以直觉超越理性,在其最高的境界上可统万端为一体,无论是物质世界的形色声貌,抑或内心生活中最细微的变化,都能如期本然地感知其个别性。绵延说是柏格森直觉主义的直接产物,他认为绵延是一条无底无岸、朝着无法界定的方向流去的河流,它是一种超越了概念和物质世界的生命的永恒。绵延说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批评都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并且成为意识流创作手法的哲学基础。

本篇所选的是《创造进化论》的第四章《思考的电影装置和机械论的错觉 各体系史的概观 真正的转化与假进化论》的第一至三节。在本书中,柏格森将时间分为两种:空间时间和心理时间。他认为绵延才是真正的时间,它像河水一样川流不息,各阶段互相渗透,交融汇合成一个不可分的永远处在变化中的运动过程。绵延也是每个人的存在,为直觉经验所感知。绵延惟有在记忆中方有可能存在。绵延是实在的而不是抽象的,它的要义在于不断的流动和变化。艺术创作的一切,无不是摒弃物质,没入正在创造进化的时间生命之流中,同时创造自身以为形式,在绵延中展开并与绵延合而为一。

(刘慧姝)